

卷首语

本期着重推介的是法国八十余岁高龄的汪德迈院士数十年来的精心之作《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汪德迈院士强调，作为科学原型的史前中国占卜技术所展开的思维，并非宗教性的神学，而是准科学性的占卜学。他把中国文字的创造归因于龟卜兆纹的外推法。认为由这种文字所承载的文言文离自然语言相当远，且十分系统规范化，体现着另一种高度抽象性。而中国文化起源于用文言文记录与卜辞有关的各种资料，与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典神话的口述很不相同。他指出西洋思维不受印欧语言的语义系统限制，因其为字母文字，可以任意创造所需的观念，而中国思维受文字系统限制，不创造文字以外的观念，因此有客观性的保证。同时，中国的文字的“能指”意义与文字发音并不一致，“能指”直接与词意“所指”相连，故而文字的“能指”意义可以向书写伸延。从这个文字系统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科学（尤其医学），与西洋传统科学（尤其物理学）的特性不同。西方思维的特性是“因果关系性的系统思维”，而中国传统科学的特性乃是“相关性的系统思维”。在与西方的比较研究中，汪先生提出一个重要概念：即中国思想的宇宙相关性。它是“宇宙——而上”的，不是“形——而上”的。这一论题是整部书的核心。现代以降，中国叹中国哲学无“形而上”之超验性者众，但未有言中国思想非重“形”因果，但重“宇宙性”者。而中国思想对这“宇宙性”的理解就在于其“相关性”。汪德迈院士在这篇文章中所谈问题极深，翻译尤为困难！他自己对这篇首次推介和诠释的文章十分重视，为有准确的译文，他特亲自选定巴黎阿尔多瓦大学新晋升的特级教授金丝燕担任全权翻译，并亲自和译者琢磨讨论过很多个早晨。这里发表的《文化转场：

汪德迈对中国思想的研究》就是这多次讨论的结晶。

在对跨文化方法论的研究中，本期还发表了巴黎高师教授米歇尔·艾斯巴涅的《文化迁变的概念》一文。作者强调任何一个文化客体从一个背景进入到另一个背景，必然导致其意义的转变，以及产生一种语义再化（résémantisation）的动力。而这一切，我们只有通过考虑其转移的历史载体才能充分认识到。法文“迁变”与一般所说的“变迁”不同，“迁变”更多地意味着变形（métamorphoser）。它不是指文化产物（biens culturels）的流通，而更多的是指对文化产物的重新诠释。因此，在人文社科领域，应当更多用杂交（métissage）与混合（hybridité）代替简单的比较和观察。我们必须把文化“迁变”更多地当作是多极的、多个语言区域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迁变”研究将揭示出文化区域的层叠交错（imbrication）。米歇尔·艾斯巴涅教授的文章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思考，对跨文化方法论的研究很有启发。

戴锦华教授主持的“从印刷媒体到数码媒体的转型”是本刊很少接触过的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前卫栏目。戴锦华教授从“未来”的维度切入。她所说的“未来”，并非专指时间。因为在她看来，时间尽管看似某种自然的、物理的维度，但却更多是某种人类心智的或观念的“事实”。例如“中国时间”指某种自然循环：日出日落、春播秋收、生死轮回。“基督教时间”则是指某种有开端与终结的时段，即线性时间。在这类时间观念中，未来意味着将至与必至。戴锦华指出历史从不是关于过去的，而是关于未来的。未来视野、未来想象决定了历史的纵深、位置与价值。目前，所谓“地球末日四乘客”，即“生态危机、生物遗传学革命的后果、体系本身的不平衡（知识产权问题以及即将到来的对原材料、食物和水的争夺），以及社会分化和排外问题的爆炸性增长。”这四种前景严重威胁着人类的未来，而人类对真切危机情势的“集体性盲目拒绝”和未来视野被末日幻想所充斥和阻断，正是当前社会文化症候的突出表征。在文学和社会生活方面则表现为崇拜自恋纵情的偶像、言情/罗曼司使现实完全坍塌了……这一

切拒绝了对未来的展望，与其共在的，只有科幻——这一在最浅表意义上拥有未来想象专利的文体，这一文体已陡然由通俗文化生产场域“提升”到思想与理论的场域。

那么，我们/人类社群是否仍渴望拥有明天呢？拥有怎样的明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问题便成了我们将如何拥有明天？拥有怎样的明天？未来必然成为对历史，尤其是20世纪历史的再度叩问。历史的寻访意味着对未来的呼唤。因为唯有未来愿景方可令历史获得意义的纵深，也唯有历史的深度方能撑起未来的可能。在此，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与中国的历史，在新的坐标和参数下，对我们产生了新的资源意义。事实上，中国对任何场域的介入，都必然将其快速放大并改变。而中国自身发展的可持续，亦不可能复制任何欧美国家的路径。因此，中国必须是未来的，拥有未来，创造未来。戴锦华教授用“二次元宅”这个约定俗成的称谓，来命名某种仍在生成过程之中并将持续演化的新型文化主体，尝试从主体与媒介技术的关系、主体与媒介文化的关系、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三个方面，来探讨这种新型文化主体在新媒介环境中所具有的特定属性。

戴锦华教授带领她的团队在她所主持的这个专栏中对崭新的现实、崭新的未来、崭新的理论展开了各方面的预测和探索。专栏的每一篇都值得认真阅读。

比较诗学也是本期一个重要栏目，主持人周荣胜教授鲜明地提出：学术界普遍认为比较诗学研究的重心就是“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以及“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现代转化”等，但是，前者天然地蕴涵着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后者天然地蕴涵着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比较诗学的学术空间因此被封闭。如果不突破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的思想束缚，比较诗学的新天地难以拓展。周荣胜认为比较诗学首先是世界视域的诗学研究，不仅仅是中西文论的比较，更不应该限制在古典文论的范围内。比较诗学还有更广阔的领域，比如，国际诗学关系研究、跨文化诗学研究以及跨学科诗学研究等。其中，

诗学翻译及翻译批评研究应是最有前景的领域。周荣胜提出比较诗学研究最关键的一步是如何摆脱二元对立的惯性思维、有效地提出某个具体的诗学问题。如《管锥编》将中国文化拆解成无数单位观念，以无数的单个引文为出发点，然后不分东西古今，不分学科界限，就一个个的单位观念进行打通研究，从而让我们以一种综合型的新眼光进入中国文化。比较诗学的理想格局应像钱锺书先生研究“诗可以怨”“通感”“包孕时刻”等问题一样，每次都采用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视域去解决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单一的国别诗学领域内没有解决好，或者没有提出来，或者不可能提出来，而一旦比较学者在比较诗学内提出并充分解答，其成果的力量足以让它们自行返回到国别诗学内的工作者那里，照出国别诗学单一视域的局限，照出诗学问题的别样解答。这就是比较诗学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侨易学”是跨文化研究方法的新尝试。本刊第33、34辑连续两次推出“侨易学的观念”圆桌笔谈，本辑又推出“作为方法论的侨易学”专栏文章，值得一读。